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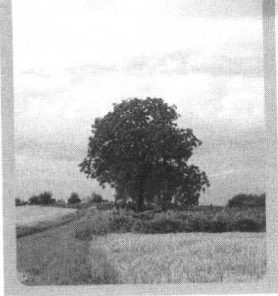
◆◆ 张冠华 张鸿声 樊洛平 林 虹/著 ◆◆



西方自然主义 与 中国20世纪文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I206.6/185

2007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西方自然主义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影响》(项目批准号: 03JD750.11 — 44008) 的研究成果, 由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资助出版



西方自然主义与 中国 20 世纪文学

张冠华 张鸿声 樊洛平 林虹/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 20 世纪文学/张冠华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80211 - 579 - 8

I. 西...

II. 张...

III. 文学研究 - 中国 - 20 世纪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0059 号

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 20 世纪文学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贾向云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绪 论

一、自然主义的历史地位

自然主义文学产生于 19 世纪后期的法国，主要代表作家有左拉、茹尔·德·龚古尔、埃德蒙·德·龚古尔，代表理论家是左拉。自然主义在法国产生以后，又很快波及德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以及拉丁美洲，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时或相继产生了相同的文学现象。自然主义文学在德国兴盛的时间是 1880 至 1890 年；在西班牙是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在英国是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在意大利是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初，持续了 30 年；在日本兴盛的时间是 20 世纪头 10 年；在拉丁美洲诸国兴盛的时间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美国文坛上确立的时期是 20 世纪初等。由此可见，自然主义文学实际上成了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这一历史阶段中世界性的文学潮流。

从纵的方面看，自然主义文学与过去的文学相比，开启了文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之先河，从另一角度开拓了对人的写实；与后来的文学相比，它充当了文学观念上的中介，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文学发展趋势上看，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念又具有超前性。因此，无论是“瞻前”或是“顾后”，自然主义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性，在中外文学史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并留下令人瞩目的一页。

（一）打破了关于人的“神话”

从人类发生学和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是人类生命结出的瑰丽之

花，是人类精神历程的形象记录，一部文学艺术发展史便是人类生命升华变迁的形象写照。所以，自人类文学艺术诞生以来，整个艺术的主题就是人的主题，就是人对自身的不断肯定，发现与开拓。不过，这个过程是曲折和漫长的。

自然主义文学诞生以前的中西文学史，可分起始文学、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三个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由于创作主体带着过滤的眼镜，人物被理想化，所以人物始终是悬在空中的“神”，只是距地面的高度不同。

在起始文学中，能够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是神话。神话的主人公虽然是超人，但这些力大无穷和能力非凡的形象，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把自己的优秀品质和创造才能对象化到这些超人的神人身上的观照和体验。可以说，神话的形式是虚幻的，却具有人本的内容。不过，神话中这些“人”是“全神”，不食人间烟火，居于高高的天空之上。

中国从诗经始至明初，西方从荷马史诗始至中世纪末，我们称之为古代文学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高扬人的理性。在中国，孔、孟制定的道德规范成为每个人物的行动的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物首先服从的是前者。《战国策·燕策》中，为了刺杀秦王、挽救燕国，田光以自刎激奋荆轲。荆轲要借秦国逃亡在燕的樊将军的头作为求见秦王的见面礼，樊将军慨然自刎。志怪小说《干将莫邪》，儿子为父报仇，至死不移。马致远的《汉宫秋》，王昭君在蕃汉交界处，为表现爱国气节纵身投江。最令人感慨的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为了个人的私仇，屠岸贾杀害了赵盾一家三百余人。为了搜捕赵家仅存的一个孤儿，他下令杀光晋国所有年龄相近的小孩。程婴、公孙杵臼挺身而出，前者决定把自己的孩子扮作赵氏孤儿，并要求后者出面告他，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后者宁愿自己牺牲，也要前者活下来。两人争论场面十分动人，这争的是死，是牺牲自己。在面临生死的重大转折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西方文学也是如此，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争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耳的妻子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阿伽门侬出兵特洛亚时，为祈祷胜利，毫不犹豫地献出女儿祭神。罗马文学中的最重要作家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主人公埃涅阿斯，虔诚、大度、公正不阿，他为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毅然放弃了爱情。中世纪俄罗斯关于穆罗姆人伊利亚英雄歌

谣，叙述了他消灭各种各样的敌人、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曾几次冒犯王公贵族，被关在地窖里，但是当敌人入侵、国王请他出来迎敌时，他以大局为重，慨然允诺，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其情节很多取自《圣经》故事或圣母和圣者的传说，使其人物扮演着上帝的“奴仆”的角色，同样没有生命冲动，没有本能欲望，没有自我。纵观这一阶段的人物塑造，可以说，他们显得崇高而又空洞，神圣而不现实，实际上仍是“半神”。

中国从明中叶到晚清，西方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中叶，我们称之为近代文学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学主题是：发现人类自身，其内涵是：主体意识的觉醒。

主体意识的觉醒，是相对于主体意识的失落、沉沦而言的。上面人们谈到，古代文学高扬人的理性，但单方面的强化理性，结果自我失落，个性禁锢，人性失调。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退步”终于被人类意识到了。创作主体开始从“自尊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肯定人的自然属性”等角度切入文学，使人物从空中向地面降落，但与地面若即若离，时高时低，并没有彻底落下来。在中国，以“三言二拍”、《金瓶梅》为代表的市民文学，也只是对自然情欲的重新认识和感受，对吃、穿的沉醉和企羡；以“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牡丹亭》等为代表的经典之作，也只是仅仅局限在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意志自由等方面。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人，但也只是从人的解放、人性的张扬角度思考，作家并没有完全把握人的自身。同时，由于基督教把人的原欲看做是“原罪”，宗教阴影始终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使原欲来到眼前时却又不敢完全正视。17世纪古典主义按照封建专制君主政治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去写人，使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现的人，又蒙上一层面纱，重新向空中升去，恢复了“半神”的面目。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文学，人物开始向地面上降落，但仍没有完全落在地面上，人物头上仍然绕着一道带有理想色彩的“灵光圈”。18世纪的浮士德深感自身存在着恶欲的冲动，但又坚信善与理性的力量，在他一生不断追求生命价值的过程中，理性与善终究战胜了原欲与恶，“人”永远不会丧失高贵的理性而变得“比禽兽还要禽兽”。浪漫主义者虽然让恶站在善的旁边，让丑靠着美，让理性与原欲处于同一平面，但他最终仍然让美与理性的象征的埃斯梅拉尔达和冉·阿让取代了一切融善与恶于一体的人。他似乎也不愿意承认人与动物有必然联系。巴尔扎克虽然已感染了自然科学的精神，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仍然囿于传统的价值规范中。他虽在朦胧中感悟到人的原欲的难以扼制，这种原欲在环境的刺激下会使人从恶如流。对此，他感到恐惧与迷惘，但对人又抱有人本主义式的幻想。

当他借高老头之口喊出“人类将要灭亡”的惊呼时，其实又深信人并非动物，人的高贵理性在一时迷失后终将复归。

与前面几个阶段的文学相比，自然主义文学打破了关于人的“神话”。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人加以观察，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人，把民族看做是自然人的族类，对人的本能、欲望、生理、遗传等自然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从遗传角度写人的有左拉的《人兽》、《小酒店》等；从性的角度写人的有龚古尔兄弟的《热尔米妮·拉赛德》、左拉的《玛德莱娜·费拉》、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等。前者写人的性饥渴，中者写人的性渗透，后者写人的食欲与肉欲的生理感受。还有的作品是写人更年期时的生理感（如莫泊桑的《如死一般强》），还有的是对少女的心理和生理发展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如埃德蒙·德·龚古尔的《谢丽》），等等。很明显，自然主义文学较之于过去中西方文学的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它真正开始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人、理解人与表现人。对此，柳鸣九先生曾给以高度的评价：“自然主义重视自然人的一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人的行为、意识、思想、感情归之于人的生理机体，并以这种观点在作品中对人物加以描写。”在西方文学史上，以往的作家在描写人的时候，往往总限于表现人的“灵”与“情”，不是善的“灵”与“情”、美的“灵”与“情”、正常的“灵”与“情”，就是恶的“灵”与“情”、丑的“灵”与“情”、反常的“灵”与“情”。即使是在真实描写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巴尔扎克，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他至多把人类的各种“情”、各种“欲”与人的气质联系起来，而自然主义文学则把人的“血”与肉都带进了文学。它所表现的人都体现了自然机能、由生理机能运转的“血肉之躯”，它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即人的“灵”、人的“情”、人的“欲”与人的生理条件、血肉之躯的关系。左拉在整个家族史小说中对人描写，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基础上，他力图将家族的生理遗传因素表现为影响家族成员的性格与命运的重要根据。同样，莫泊桑也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他的笔下，杜洛华这个人物与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虽同为野心家，但在拉斯蒂涅身上只能看到野心、贪欲、谋略与手段本身，而杜洛华的野心、贪欲、谋略与手段，则往往与生理的要求与冲动有关。在另一部作品《一生》中，莫泊桑也表现出婚姻生理学是影响男女主人公的家庭关系、决定女主人公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主义文学的这种描写从另一个方面开拓与充实了对人的写实，对 20 世纪文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①

^① 参见柳鸣九：《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17 页。

显然，自然主义文学把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重要性强调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力主张把自然科学的成果引入对人的认识与对人的描写之中，主张从生理学与遗传学的角度扩大与深化对人的认识及描写，打破了讳莫如深的禁区，让一切客观的存在——社会、环境、人性、人欲乃至人的生理机能都获得了进入文学殿堂的权利。文学于是有了自己更丰富的题材，更广阔的天地。人物回到了地面上，对人物的刻画又纵深了一层。

这一发展无疑是划时代的，尽管它有这种那种缺点与局限性，但它至少在深化对人的描写、拓宽现实主义道路两个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罗梅洛所说：“这位伟人试图在他的字里行间推翻浪漫主义大厦，然后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文学艺术的新的宫殿。多少同时代的作家为此努力，可达到目的似乎只有左拉一人。”^①

（二）充当了文学观念上的中介

自然主义文学使西方现实主义时代画上句号，为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温床，从一定意义上说，或可视为先驱，视为文学观念嬗变的中介。

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关于人的观念。从自然主义文学开始，“人”的含义被重新订正过了。之前，整个古典时代直至现实主义，虽则对人性划出精神和肉体两大方面，却同时褒此抑彼，不承认肉体为真正人性的显现，而说成是人的自我否定的一面，并且用精神制约之，超越之。这一点在爱情描写上暴露最充分。那个时候爱情几乎不涉及性的因素，主人公为荣誉而爱、为精神而爱、为义务而爱，唯独不提性冲动、视觉等感官刺激。自然主义文学从生理学、生物学的观点看人，认为人并不是超脱于动物之上的某一特殊生灵，他首先是生理的人，其次才是社会的人，他身上充满着各种本能和欲望。同时，人的真实境况与其说表现为如何以理想力量支配了环境，不如说表现为他被卷入环境的复杂之中，被自我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支配；人所处的社会不是被人类幻想净化过的理性世界，相反，它是一个生存在本能、盲目的遗传性、彼此利用等现象中的无情世界。这些观点为后来现代主义作家所接受并予以发展，成了他们写人的普遍思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自然主义创作把“人”的形象从理性主义的圣堂拉回到了生物的世界中，是“人”的神话破灭的先声。此点既是对传统理性

^① 罗梅洛：《自然主义评价》；柳鸣九：《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页。

主义文化的反拨，又是对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的催化。^①

1988 年 10 月，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就左拉及自然主义问题在京举行了研讨会。与会的同志一致指出：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左拉就已经自觉地运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方法，描写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的现代人的生活，这说明他是介乎传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艺术理论及艺术实践都有许多值得今人借鉴的地方。^②

关于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蒋筑勇先生讲得更为详尽：

事实上我们无法否定左拉创作中的新文化观念对 20 世纪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指现代派文学对性本能、性心理、“恋母情结”、白痴、虐待狂、偏执狂、荒诞主题、病态精神、色情狂的描写都和左拉的创作有渊源关系，更重要的是，左拉小说中表现的“生物的人”这种思想，在他之后进入世界各国的小说创作；这种“生物的人”的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文学对人的描写的既有领域，而扩展到了人的生物领域。这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是相关联的，他们是被同一条文化纽带所串联的。“生物的人”虽然不同于现代主义文学热衷描写的“非理性的人”，但已经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与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链条上的中间环节，他的创作在文化观念上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重性，正是他开创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与文化的价值之所在。^③

可见，19 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实现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原始积累，它作为中介，沟通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血缘联系。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主义者要“反传统”，但历史的“宿命”却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传统的子孙。

（三）得到验证的创新

如前所述，自然主义文学最大的创新在于，它主张剖析形成人物性格的、影

① 参见蒋筑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4 页。

② 《左拉问题研讨会在京举行》，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 年第 1 期。

③ 蒋筑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6 页。

响人物言行的生物性根源，这是几千年的文学艺术史所忽视的东西。这本是自然主义文学的贡献，但却成了它的罪行之一，至今还成为人们诘难自然主义的口实。如果说，过去由于缺乏人类学知识，像这样批判自然主义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天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本世纪人类学到了迅猛的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学系统，有人类进化史、哲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环境人类学、未来人类学等，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遗传、情感、价值、需要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用这些成果去反观一百多年前的自然主义文学，便会发现，自然主义关于塑造人物性格的思路是无须过多挑剔的。人物性格的形成、人物行动产生根源，既有后天因素，亦有先天因素。

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学术界发生一场关于人类动物性和人性各占多少的争论，最后双方达成共识：人性占20%，动物性占80%，二八开。这是个可怕的结论。日本知名的经济人类学家粟本慎一郎认为，人类的行为特征与动物行为特征的区别在于：人穿着“裤子”，人只是穿“裤子的猴子”。英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莫里斯从动物学观点出发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作了考察，他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人没有长毛，人是“裸体的猴子”。他认为人类的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是不平衡的。我们常常自豪于我们人类的文化进化和创造，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遗传基因的步骤拖拖拉拉，总是跟不上文化的进步，因此，人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裸猴”，在许多方面还都因袭着其祖先的生物习性和行为模式。比如我们人类的性行为系统和摄食行为，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角度上，就完全师承了其祖先的遗风，今天进步的人类仍然食用与远古狩猎祖先几乎一样的基本食物。他说：“人类的文明史不过才一万年左右，因此我们在根本的生物性上和我们狩猎的祖先没有什么两样。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民族，我们都来源于同一个根，我们的遗传都具有同样的性质，我们都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猴。”他最后的结论是：“人类的全部行为几乎都可以用生物学来解释。”^①

当然，他们的结论也许是出于矫枉过正的心理，带有夸张性，无疑有些失之偏颇。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类，就不完全等同于动物。但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的迅猛发展和重大发现，人类不得不重新反省自身。人类过去把头昂得高高的，现在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低下那自尊的高贵的头颅。它使我们认识到：人，曾来源于动物界，如今仍未完全脱离于动物界；人，首先是一个生物性的人，然后才是

① 莫里斯：《人类动物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一个社会的人；人，既要有优越感，也要透过优越感看到赤裸裸的自身的劣根性。在自省中，人类才会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才会建构完美的人格和性格。人，只有认识了自身，才能超越自身；只有了解了自身，才能把握自身。因此，人类不应回避而应重视自身的生物性。

现代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生物性制约着人的性格和行为，具体说有三个作用：

其一，对人的行为起着动力作用。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提出“欲望更替论”。他认为，人类有一种不满现状，不断追求新东西的欲望。第一代人的需求被满足之后，第二代人又会出现新的需要；第二代人的需要被满足之后，第三代人又将不断出现新的产品、新的部门、新的满足需要的方式，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推动了社会前进。罗斯托将其“欲望更替论”称为“布登布洛克式的动力”。

“欲望更替论”一方面说明人的欲望难填，另一方面说明人的很多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欲望的满足来进行的；人的欲望是影响人的行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人类的生物性中，如前所述，有各种各样的本能和欲望，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一生是不同程度地为满足这些本能和欲望而奋斗的一生。这样，人的生物性便成了人行为的动力。比如，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他便会积极地行动起来，用各种方法去获取食物，甚至铤而走险；情窦初开的年轻人，被爱的渴求所支配，容易产生“爱情至上”的观念，在行动上便是对异性的接近和追求等。

其二，提供了人们行为发展的潜在能力。

人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所可能发展的行为特质。人们在一生所作所为受到生物性所提供的潜在能力的限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人们性格和行为的基础之一。如同菜和菜肴的关系一样。尽管人们可以开发出成千上万的新菜肴，但也没有办法将素菜变成荤菜；肉做的菜总有肉的特征。生物性和人们的行为、性格的关系亦然。由于遗传关系，天生就是内向性格的人，一般情况下很难发展成为外向性格的人。我们平常总说“天才出自勤奋”，这句话是正确的，但不能否定人智力的遗传基础。这句话的重要前提是，在遗传天赋相近的一群中，勤奋者聪明才智提高得更快。或者反过来说，遗传素质越差者，需要的努力越多，而对先天性的痴呆人，即使有大量的智力投资，也无济于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物性提供了人的行为、性格发展的潜在能力。

其三，人类的生物性渗透到人的情感、意志等行为当中去，渗透的程度制约影响着性格的特性和随机性。

性格是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它的表现在一定阶段内总是以相似的状态和行动出现在人们面前，不论什么场合，即使本人不喜欢自己的性格，可是他也很难按别人的性格来行动。另一方面，性格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是始终如一、丝毫不变的。同一性格特征，在不同的情景下，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就是性格的情景性，或者说是特殊性和随机性。如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小豹子，老成、憨厚、正派，谁也想不到，当存妮脱毛衣无意露出上身时，他像出洞的野豹一样猛扑上去，行为像流氓、像无赖。刘兆林《船的陆地》中为人师表、关心同志的指导员，在和一名战士外出开会的途中，将钱丢了，两人饥肠辘辘，在仅有的一大一小两个西红柿面前，指导员煞费心地占有了大的一个，行为像市侩，失去了指导员的风范。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有心理上、情感上的，亦有生物性上的。上述两个例子，相对说，前者和人的性本能有关，后者和人的吃本能有关。

我们在这里阐述生物性对性格的制约作用，并无意忽视人的社会性。

人的性格和行为，有生物性根源，但并不是唯一的根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社会关系恰似一张巨网，每个人犹如网上之结。从社会层次的关系上看，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层次中充当特定的实践角色和拥有相应的心理背景；从社会的不同性质关系上看，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关系中活动着，充当这些社会活动的特定角色和拥有特定的心理背景。因此，一个人处在多层关系中，具有多重的社会性质，总体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人所必备的人格；社会作为人类存在的群体形式，对于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极为重要，没有社会就没有个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既然人是社会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性格就不单是由生物所决定的，它应是社会性和生物的统一体。这是我们已经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还应明白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统一体中，社会性属主导地位。爱因斯坦说：“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大部分取决于我们童年时代无意识地 from 周围环境吸取见解和感情，换句话说，除了遗传的天赋和品质以外，是传统使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我们很少意识到。”^② 这里说的“传统”，包括传统的教育方式、社会观念、强化性格的模式、自我塑造的形式等。人在偶然的因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素下生为男女，而男女的很多性格特征是在双亲、老师、邻居等人反复教导下形成的。个体出生后，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针对不同性别的孩子而有不同的教养、抚育方式，不同的要求和期望，个体亦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性别角色塑造自我，逐渐使自我的行为根据自己所确认的性别身份，按照社会上公认的行为规范和方式而习惯化和固定下来，从而形成相应的性格特征。另外，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所处的社会地位、所经常交往的人等会对他性格形成起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性格是由社会铸造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集中阐述生物性对性格的制约作用，并不否认性格中的社会性根源，其目的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人物性格、行为中的生物性已被今天的人类学的研究所验证，而一百多年前自然主义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创作中付诸实践，这是自然主义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们看重的地方，说它具有超前意识不算过分。

除了上述的三个贡献以外，自然主义还完成了西方文学从贵族化到平民化的最后转变，从重视情节到重视细节的最后转变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没有绝对的好，亦没有绝对的坏。自然主义文学的不足也是明显存在的，它有贡献，亦有弊病。它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它的观念和它的创作实践不统一

自然主义的理论是比较系统的，但为了强调客观、真实，有些见解带有绝对化倾向，且不能完全付诸创作实践。比如左拉关于作家“只当解剖家，不当道德家”，反对文学倾向性的论述。许多论者指出，这一点作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西方论者弗斯特和斯克爱英谈了三点理由：一是作家的观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因为观察者的眼睛不是没有生命的照相机镜头，自然主义作品中的现实描写也必然打上个人的烙印。”二是文学使用的是语言符号，而语言本身带有作者思想性、情感性。“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即在把现实转变为艺术的过程中”，“每一部小说和戏剧在风格和观点上都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个人的印记”。其三，想象是作家必备的心理素质，作家因不能穷尽生活而必然会依赖于想象，所以“作家开始也许只是冷静地陈述事实，但不知不觉中就开始采用想象、象征、呼唤以及充满诗意的形容词”。“自然主义旨在描绘现实，但一经检验很快就能发现这些现实图画只不过是想象中的现实的再现”。^① 柳鸣九先生指出，从整体上看，自然

^① 利里安·R. 弗斯特：《自然主义》，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1 页。

主义作品并不是无倾向性、无思想性的，“众所周知，左拉是要求自己的自然主义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成为一个充满了疯狂奇特时代的写照’，因而，这部作品尖锐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并不亚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且，其中的一些主要作品如《萌芽》、《土地》、《崩溃》的结尾，都充沛着作者对光明、对社会进步、对民族与人民的理想与激情。同样，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也具有明显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性质，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则带有反封建主义的色彩，拉美的自然主义文学对落后、腐朽、野蛮的社会现实也起了充分暴露的作用。还应该特别指出，有相当一大部分自然主义作家，比他们现实主义前行者，具有强烈得多的民主主义情感，左拉较之巴尔扎克，政治思想立场就远为激进，他是法国文学史上作家兼斗士的突出范例之一”。^①

2. 有些作品存在着把生理遗传因素加以绝对化的倾向，对人的社会性的深掘不够

自然主义作家从生理与遗传的角度写人，固然开拓了对人的描写领域，但有些作品由于机械地运用生理学原则，强调遗传因素和人的自然属性，就削弱了对人的正常人性与社会性、阶级性的开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刻画。

3. 忽略了艺术形式的探索

自然主义着重于艺术内容的开掘，而对艺术形式的改革与创造则缺乏重视。弗斯特说自然主义轻形式是有道理的。另外，自然主义文学严格的写实，尽管带来了某些重大的文学贡献，但有些作品缺少艺术的加工与提炼，过于繁琐，造成了叙述与描写上的呆板与滞重。

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正是带着上述的独特性、新颖性、前沿性，同时也带着它的偏执和缺陷登上了中国内地，与中国20世纪文学发生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关系。

二、关于自然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坛，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充满着张力，两者既有对抗，也有对话，既有融合，也有冲撞。在这种张力中，自然主义以其独有的魅力，顽强地影响着中国文学。不就自然主义自身，而就自然主义与中国

^① 柳鸣九：《自然主义·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文学的关系而言，这种影响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来自文化先驱们的热心介绍和极力倡导，最先介绍自然主义的是 20 世纪初的陈独秀，随后，梁启超、郭沫若、李劫人、田汉、周无等纷纷撰文推崇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开始在中国亮相。1921—1922 年，以茅盾为首的人生派利用《小说月报》为阵地，极力倡导发展自然主义文学，并由此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这些倡导和讨论为自然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提供了温床，影响从此便真正发生了。其后，鲁迅、冯雪峰、陈望道、茅盾等又不断翻译日本、德国的自然主义理论文章，或者撰写评介自然主义的论著，进一步加速了自然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第二方面来自对自然主义的否定和批判。30 年代的“左联”，开始否定自然主义，这种否定到 50 年代、60 年代逐渐升级，变成上纲上线的批判，并且将其泛化。凡是不为当时文坛所接纳的东西都冠之为自然主义。在“文革”中，作家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若说哪个作家的作品有一丁点自然主义的东西，便如同在政治上被打成“右派”、判了死刑一样。由于人类普遍存在着逆反心理和好奇心，这种否定和批判，反而扩大了自然主义的知名度，加速了它的传播。这是否定者、批判者所始料不及的，历史给他们开了个大玩笑。

第三方面来对自然主义文学和理论的研究。1988 年以降，关于自然主义，中国开始扭转“批判有余，研究不足”的局面。以柳鸣九、郑克鲁为首的法国文学研究者，首先开始公正的、客观地、详尽地研究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其他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紧紧跟上，以拨乱反正的姿态，切入对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拉丁美洲等诸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不再以讹传讹，而脚踏实地地开始对自然主义理论进行梳理、辨伪、论证等研究工作。上述研究还自然主义本来面目，使其“误读”成为历史。

在上述三个因素作用下，自然主义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坛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从具体作家来看，受其不同程度影响的有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郁达夫、沈从文、李劫人、张资平、冯骥才、方方、池莉、刘恒、张辛欣、桑晔、周同宾等；从创作现象来看，受其不同程度影响的有新时期新写实小说、新闻小说、报告小说、口述实录文学、新体验小说、历史纪实文学、当代纪实文学等。

西方自然主义虽然对中国的文学影响比较大，但两者的关系始终是坎坷不平的。自然主义几起几落，厄运连连。但它的这种遭遇留给我们的思考更多，启迪更大。

鉴于此，本书将对西方自然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遭遇作全方位的思考，它既

是自然主义传入的考证，又是自然主义被批判、被接受过程的扫描；既是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渗透于中国文学的探索，又是自然主义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总结。具体说来，它由三大块构成：

1. 从史的角度，分时期考察百年来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生存状况、研究状况，总结文坛上批判自然主义的特点及原因。这一块基本上是荒漠地带，本书将下力开垦。

2. 从论的角度，探讨自然主义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具体影响。与其他论著的不同之处，这一探讨将是较为缜密和系统的。

3. 从逻辑的角度，探讨自然主义影响中国文学的特点、原因以及在自然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并对自然主义在中国的未来作一展望。这一块基本上也属于问津不多的地带，本书亦将下力开掘。

这样一来，本书基本上能够做到史与论、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通过这样的努力，企图初步疏通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总结在这样关系中应吸取的经验教训。经过这样的努力，也许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能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目 录

绪论.....	1
一、自然主义的历史地位.....	1
二、关于自然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11
第一章 西方自然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1
一、备受欢迎的文学宾客	
——自然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扎根.....	1
二、堂吉珂德剑下的风车	
——自然主义长达 60 年的厄运.....	27
三、春风吹又生的野草	
——后新时期自然主义的回归	47
第二章 西方自然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上）	52
一、茅盾与自然主义	52
二、郁达夫与自然主义	72
第三章 西方自然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下）	86
一、自然主义与张资平的小说创作	86
二、李劫人与自然主义	95
三、沈从文与自然主义.....	111
四、路翎与自然主义.....	127
五、张天翼与自然主义.....	141